

## 绪 论

—

民族迁徙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或部分，由于某种原因离开原有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进入另一生存环境居住的民族分布变化过程。整体性的迁徙在远古的部落或部族时代较为普遍，民族形成之后的迁徙多为部分人口的迁徙。

民族迁徙有可能使一个民族的人口和文化重心发生转移。譬如傣族，明代主要分布在碧罗雪山以东的丽江、宁蒗、永胜、维西等地，到清代中期，傣族的人口和文化重心已移到碧罗雪山以西的怒江峡谷。古代北方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有规律按季节变化循环迁徙放牧，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迁徙；解放前云南部分地区的拉祜族苦聪人也采取类似方式迁徙耕猎，当这种循环迁徙体系的某一环节稍稍变动，大规模的无序迁徙就必然发生。

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有过迁徙的历史。并且，距今越远的年代，民族迁徙活动就越频繁，云南的民族也都如此。一个民族固定生活在一个地方，千百年不扩大其分布面的情况是十分少见的。当然，居住区域缩小的可能性也同样存在。由于迁徙与一个民族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关系，民族史学家们在书写一个民族的历史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个民族从哪里来？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多长时间？由于涉及一个民族的文化渊源问题，民族学家们在写民族志时也需要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根据一个民族迁徙到某一地区时间的长短，西方文化人类学者把一个从形成至今未迁徙，或者迁到某地后一直生存了两千多年的民族称为原居住民族；在某一区域根植的时间少于两千年，但多于五百年，该民族被称为古代移民；如果一个民族自迁徙以来至今还不到 500 年则称为近代移民。<sup>①</sup> 古代的云南民族，历史学家们把他们分为氏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系，语言系属对应关系是：藏缅语、壮侗语、孟高棉语。这之中，氏羌系的各部族、部落迁徙游动性最为频繁，这个系属的各族是在不断迁徙的作用力下，不断地分化、融合，形成多个单一民族。而百越、百濮系的民族成份却不复杂，古代的历史脉络也相对清晰可查。云南的藏族是公元 7 世纪青藏高原上南下的吐蕃人的后裔；蒙古族和普米族、回族是 13 世纪蒙古军南征时迁入云南的。内地汉族明代以前就有大量迁入云南，但这一时期，云南的民族构成还是夷多汉少，明代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政策使这一时期迁入云南的

<sup>①</sup> [美] 凯西·F·奥特拜因《比较文化分析——文化人类学概论》，章智源、张敦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汉族人口最多，规模最大。唐代的史料就有苗族、瑶族先民分布活动于云南的记载，但苗瑶民族大规模入迁云南是在清代。满族也是清代才进入云南。

应该指出的是：云南民族众多，与国外民族的历史发展，尤其是西方民族的历史发展历程不同；而且云南民族之间的社会历史发展也极不平衡，除了历史上的战争迁徙和政治迁徙外，大多数民族的迁徙常常是时断时续或延绵不断，没有明确的起止时间。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来划分云南的原住民、古代移民或近代移民。

## 二

民族分布的历史变化，起决定作用的是迁徙。民族迁徙则主要有 4 种动迁原因，即：（1）战争动迁，（2）政治动迁，（3）生计动迁，（4）自然灾害和疾病动迁。

大规模民族迁徙最普遍的原因是战争。某个民族倘若在战争中失败了，如果民族没有被消亡或被胜利者兼并，那么这个民族就必然要迁徙。如果这一个民族迁徙到一个已经有其他民族居住的地区，那么新的战争又很可能爆发，如西汉时居住在河西走廊的月氏民族，公元前 174 年前后被匈奴打败后，大部分向西迁徙至今新疆伊犁河上游地区，赶走了原在当地驻牧的塞人（希腊种人），自己定居该地。但不久，由于乌孙西进，月氏又被迫从伊犁河上游再次西迁至今中亚阿姆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的大夏人，开始定居生活。因此说，战

争引起迁徙，迁徙又常常伴随着战争。

政治动迁通常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出于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将本民族的部分或其他民族迁离原居住地，安置于另一民族的分布区内定居的分布变化过程。政治动迁主要是采取强制性手段。如南诏时期阁罗凤将云南东部 20 多万户“白蛮”迁到今滇西地区，使云南“白蛮”的分布相对集中于大理地区，这也为日后建立以白蛮为主体的大理国奠定了人口基础；又如从西汉至清代，历朝中央政府都采取过强制移民垦殖的政策来巩固边防，明王朝在西南地区规模空前的“移民实边”政策，使云南的汉族人口首次超过了当地的少数民族；再譬如原聚居于东北的锡伯族，18 世纪中叶，3000 多锡伯族被清政府迁往新疆，这次迁徙，使锡伯族的人口和文化重心发生了转移。非强制性的政治迁徙规模相对较小，主要是统治者诱导所致。如清乾隆时招募一批景颇族进入腾越地区服役，部分景颇族随之南下。

生计动迁是为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而产生的迁徙。生态的压力往往是动迁的主要因素。如云南彝语支民族和苗瑶语民族的迁徙，就是与生计方式密切相关，这两个语支的民族古代的耕作方式主要是刀耕火种。刀耕火种对生态环境有较大的破坏，为了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刀耕火种民族需要通过地理上的移动来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非刀耕火种的民族，随着人口的不断繁衍，土地的负载能力日益加重，在科技水平不能有所突破的情况下，迁

樊绰《蛮书》卷 4。

魏源《圣武记》。

出一部分人口无疑也是维持原有生活水平的最佳选择。同时，民族的迁徙分支，也有利于扩大一个民族的通婚范围，对提高本民族的素质也大有好处，古代彝族的“六祖分支”就有这一层含义。生计动迁具有规模小、时间长、渗透力强的特点。进入近代社会，随着中央集权对边疆地区的进一步控制，民族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减少了。这一时期，生计动迁显得更为突出，清代入迁云南的苗族、瑶族、入滇开矿的汉族大多就是因生计而来。即使是到了现代社会，生计动迁也是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式。

自然灾害和疾病也是导致民族迁徙的因素。灾害的发生，譬如长期缺水，造成干旱，草原上的放牧条件被破坏，游牧民族就不得不离开原来的放牧区域向外迁徙；山地农耕民族也不得不放弃原有山地，寻找湿润山地进行耕作。疾病对于山地民族的影响相对来说较小，因为冷凉的山区不利于疾病大面积传播，而对坝区的稻作民族则有较大的威胁。热带、亚热带地区更为明显。灾害和疾病引起的迁徙越远古的年代，发生的频率就越高。

### 三

文化是维系民族的纽带。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单一的民族归属，当一个民族发生迁徙之后，他们的文化就会随之移动到一个新的地方。如果没有民族的迁徙，古代民族仅靠商业上的一些间接交往，地域相隔甚远的北方草原的蒙古文化，东

北黑山白水地区产生的满族文化，新疆和西北地区的“色目人文化”，源于两湖地区的苗瑶文化就不可能进入云南。同样，如果没有古代氏羌的南迁，藏缅语各族文化在云南就不会存在。因此说，民族的迁徙就是文化的迁徙，迁徙使云南成为多种文化的汇聚区。

民族迁徙对于文化的影响最具普遍意义是文化的传播。迁徙所造成的文化传播有这样两层含义：（1）迁徙造成一种文化产生空间上的移动，民族迁徙事实上就是文化迁徙；（2）迁徙使不同民族群体间产生广泛的文化借取，促成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两个原先独立的文化群体，迁到一地之后，由于持续地接触和交往，双方或一方的文化可能会发生规模性变迁，这种变迁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交流，也可称作“涵化”。

每一种民族文化的形成总是与一定的生存环境相适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当一个民族迁入另一个新的地理区域时，迁徙者的文化将面临着与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问题。长期选择高山密林迁徙的民族群体可能主要面临的是与自然环境的适应，这样的民族群体，对外的文化借取相对较少，民族传统文化结构相对稳定，不易发生大的变化（但长期适应过程中表层文化还是会发生一定变异）。如东来的云南大部分苗族和瑶族，他们虽历经迁徙，分散各地，但苗瑶文化特点仍十分突出，人们往往仅凭视觉就可以把他们和壮族、汉族区别开来。而大多数迁徙的民族群体面临的是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双重适应，尤其是对后者的适应。一般情况下每一个民族都有保持传统的惯性，并且民族形成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为征服自然，抵御外敌，居住都比较集中，民族

和民族之间保持有一定的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民族迁徙分散成若干群体后，原先彼此相距甚远的两个或几个民族成为了邻居，民族间的地理阻隔和心理距离大大缩短了，彼此之间有了直接接触的机会，为民族间文化的借取创造了条件。环境的变化也必然引起迁徙者社会内部文化借取的需求，于是民族迁徙后广泛的文化借取活动就被促成了。文化的借取是双向的，民族群体不分大小总是有一些优秀的适应生存的文化因子可以借鉴。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民族群体的迁徙，甚至各民族人口的移动都是民族间文化传播的主要动力，因为那时贸易往来方式的文化传播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

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尤其是民族大迁徙，对云南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来自不同地方的两个或几个民族群体，当他们迁入一个共同的地区之后，经过长期的经济文化接触，相互间可能产生认同感。尽管文化的某些层面还将有差异，但仍可以合成为一个新民族。这一新民族的名称有沿用原来其中一个民族群体的名称，也有采用新名称的。通常，文化上相近的民族群体更容易合成为一个民族。

云南境内山河交错纵横，湖坝星罗棋布彼此相互隔离，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得民族群体迁徙后，很容易同其母体中断或失去联系。离开母体的民族群体，在对新环境的适应过程中，其文化会逐步与母体产生差异性，形成支系文化。支系文化的特点是：文化的底层保持其母体的主要特征，表层则发生适应性变异。支系文化的继续发展就可能形成新的民族。云南的地理环境使古代民族迁徙后多呈分化的态势。而在北方草原和中原地区，民族大迁徙的结果往往是民族大融合。

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有较大抵触的两个民族迁居一个地方后，互相间也可能发生文化的冲突。文化冲突的解决方式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通过战争，一方征服或赶走另一方；二是 一方自行避让，和平解决冲突。

被迫迁徙的民族，如果退到一个生存条件较为恶劣的地方，其社会文化的发展会受到阻碍，甚至倒退。倒退主要反映在通婚范围的缩小和某些技术的丢失，如金平拉祜族纺织技术的丢失。

迁徙民族受地理环境影响，内部联系较为松散。而刀耕火种生产又有用地面积较大、居住分散、定居时间短的特点，这就使得许多迁徙民族内部的阶级关系不易确立，社会的发展速度受到制约。因此，解放前，云南保存原始公社制残余的民族和人口数在全国是最多的。

长期游动迁徙的民族，其文化特征会打上深刻的迁徙烙印。“迁徙史诗”就是较典型的民族迁徙特有文化，这在定居的稻作民族中是难以找到的。但迁徙传说、谚语、歌谣在各个民族中都可以找到。云南迁徙民族中，哈尼族、拉祜族、苗族的史诗最为恢宏；彝、白、纳西、怒、景颇等民族有相当于迁徙史诗的“指路经”；云南苗族妇女有在百褶裙上绣三条平行花边的习俗，用来印记祖先从黄河流域南迁到长江流域，再迁到云南的迁徙历史。

民族的大迁徙在近现代社会已十分鲜见，但各民族人口的迁移却从未中断过，这种迁移随人口的日益增长和科技的进步急剧增加，其流向与古代的生计动迁恰好相反，大量的人口涌入投资集中的大城市，由此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文化问题。

## 第一章 云南民族的迁徙来源

民族迁徙引起民族分布变化，而从民族分布的历史变迁又可以看出民族迁徙的脉络。

云南境内现有 4000 人以上的民族 26 个，他们是：汉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壮族、苗族、傈僳族、回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瑶族、景颇族、藏族、布朗族、布依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蒙古族、水族、满族、独龙族。<sup>①</sup> 这之中，汉、藏、回、普米、蒙古、苗、瑶等民族入滇时间稍晚一些，其余民族是云南境内最早的居民，他们分别源于先秦时期的氏羌、百越和百濮。

据 199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 一、古代氏羌南下与濮越北上

### (一) 氏羌南下

氏和羌是同一部落集团，古代氏和羌的聚居中心是今西北甘、青地区，在古代的文献记载中，有时并称为：“氏羌”。如《山海经·海内经》说：

“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氏羌。氏羌 乞姓”。

公元前 7 世纪秦国向西开拓用兵，大量氏羌被迫南迁。《后汉书·西羌传》说：

“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獠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秦献公以后，西北羌人迫于秦的军事压力，在原来向外流动路线的基础上，开始了更大规模、更远距离的迁徙，大量的羌人继续向西南移动。这些迁徙的羌人与当地原有的土

著居民共同生活，由于自然环境和迁徙地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迁徙路线不同的羌人，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史记·西南夷列传》说：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今大理），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嵩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最大；……皆氏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西南夷”多数部落都属氏羌民族系统，他们分布于云南北半部地区，尤其是滇西北地区。

## （二）濮越北上

濮人和越人是我国古代南方的两大族群，因支系众多而被称为“百濮”和“百越”。百越的分布重心在江浙至两广地区，延绵云南南部；百濮的分布重心在西部越人地区，与百越族群交错杂居，文化习俗有部分相似。

公元前 8 世纪楚武王向濮人地区扩展，“始开濮地而有之”。公元前 7 世纪前后，楚庄王继续对濮人地区进行拓展，灭掉了濮人建立的庸国。江汉地区的濮人被迫向今湘西迁徙。楚平王时楚国“楚子为舟师以伐濮”，退往沅江流域的濮人，又再次被迫迁徙，大量向西迁往贵州、四川、云南，汇入西

南的濮人、越人地区。<sup>①</sup>濮人的人口和文化重心移到了西南地区。大约在公元前 8 世纪至前 6 世纪期间，西部濮人中的一部分就沿澜沧江流域及古代称为濮水的元江及上游的礼社江北上，到达今大姚、永仁，进入金沙江河谷及安宁河下游，《华阳国志·蜀志》越巂郡会无县（今四川会理）说：“渡泸（金沙江）得住（堂）狼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家，家不闭户……。”考古学者根据对上述沿线地区“大石墓”的考古研究，也认为是濮人遗存，文化与今天云南的孟高棉语民族有渊源关系。

从云南新石器考石的文化遗存看，公元前 2000 年，云南的河谷、湖坝地区就有越人先民居住，<sup>②</sup>以后，两广地区的越人又相继进入。战国至西汉时期，岭南地区的越人在中央王朝大力开发长江以南的军事压力下，又继续进入云南。

公元前后，云南民族的分布格局是：南部地区濮越杂处，北部地区氏羌占据；濮越与氏羌，北上、南下交汇于滇池——洱海一线，越人居坝区，濮人多居坝区边沿，氏羌分布于山区。

经过长时间的民族迁徙、分离、融合，汉晋时期，云南境内形成了多个民族群体：

① 宋蜀华《百越》，213—218 页，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 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③ 汪宁生《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 年版。

(1) 以滇池为中心，在滇中和滇东北地区有：滇、劳浸、靡莫、僂、叟、爨等部落。

(2) 在滇西地区有昆明、叶榆、桐师、哀牢、嵩唐等部落。

(3) 滇西南及以西以南的地区，居住着《史记·太宛列传》中称为“滇越”的民族集团，《后汉书·西南夷传》和《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则称这一地区的民族为“掸人”。

(4) 滇东南和黔西有夜郎、句町、漏卧、且兰等部落。

(5) 在滇北和川西南有邛都、徙、苻、摩沙夷等部落。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滇池的西北和东北多为氏羌系统的民族居住；滇南、滇东南和滇西南多为百濮和百越系统民族交错杂居。

云南境内的民族，历经漫长的迁徙、融合、分离后，到唐宋时期，民族分化才较为明朗，才基本可以确定古今民族的族源对应关系。

## 二、氏羌系民族的迁徙

### (一) 彝 族

秦汉时期，滇西的土著民族昆明族已向东迁徙至滇池以西地区，西汉末又向滇东北、黔西及凉山地区迁徙。昆明族

在东迁的过程中被南下的氏羌民族逐步融合。到唐代时，多称为乌蛮。唐中叶，乌蛮大部分和近代彝族的对应关系已日趋明朗。公元 738 年，滇西蒙舍诏乌蛮首领皮罗阁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起南诏国。南诏国的建立标志着乌蛮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共同体已完全从氏羌中分化出来。这时，远在滇东北、滇北的乌蛮，由于与南诏王族同属一个民族，关系十分密切，《新唐书·南蛮传下》说：“乌蛮与南诏世婚姻。”

唐代，彝族的分布随南诏的拓展而扩大，但人口和文化的重心还是在滇池——洱海一线北面，向南则散布元江下游。据《蛮书》记载，东爨乌蛮地区“南至步头（今元江）。”

元明时期，彝族被称为“罗罗”，其分布大致与唐宋时相同，重心在滇东北地区。滇南、滇东南迁入人数增多。李京《云南志略》说：

“罗罗，即乌蛮也。……自顺元（今贵阳）、曲靖、乌蒙（今昭通）、乌撒（今威宁）、越嵩（今西昌），皆此类也。”

天启《滇志》卷 30 载：

“纳楼茶甸长官司（今建水南部）土官普少，罗罗人，洪武初归附……”。“妙罗罗，皆土酋官舍之裔，……在阿迷州（今开远）为诸种所敬惮，……。”

“其在王弄山（今文山县西部）者，不著其种汇，止曰罗罗，……。”

清代，由于改土归流的军事镇压，滇东北、滇北的彝族大量迁往四川凉山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彝族人口急剧减少，彝族聚居区变为彝族杂散居地区。而四川凉山的彝族则由于冤家械斗，大批迁入云南小凉山地区。

到清末，云南彝族的分布形势已变成：以滇西北小凉山，滇中楚雄地区，滇南红河流域为聚居区，散布云南各地的分布格局。

## （二）白 族

白族是古代氏羌的一支经四川南部、滇东北、滇东南下，然后西进洱海地区，在这一迁徙过程中，融合了汉族及昆明等土著民族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先秦时期，氏羌中的一支“僰人”南迁至今四川宜宾地区，建立了僰侯国。《史记·西南夷列传》张守节《正义》说：

“今益州南戎州，北临大江，古僰国。”

杜祐《通典·州郡典》也说：

“南溪、故僰侯国。”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说：

“僰，羌之别种也。”

《说文·人部》说：

“僰，犍为蛮夷。”

此时僰人的经济文化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并南迁至滇东北、滇东地区，融合了当地的土著民族。《太平御览》卷 791 永昌郡（传）说：

“朱提郡，治朱提县（今昭通）。川中纵横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口，僰名千倾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与僰道接。”

汉代在原“五尺道”基础上开通的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因起于爨道县，经过爨人地区，而被称为爨道。元人李京的《云南志略》在追溯白族来源时说：

“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爨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宜宾）属县是也。……今转为白人矣。”

汉晋时期爨人主要分布于滇池以东及周边地区，一部分进入了滇中和滇西地区。东部爨人与入迁的汉族交往密切。

唐代，爨人的大部分，在吸收了汉族文化和人口的基础上形成单一民族——白蛮（即今白族）。唐代的白蛮分布，《蛮书》卷4说：

“西爨白蛮也，……在石城（曲靖）、昆川（昆明）、曲轭（马龙）、晋宁、喻一献（澄江）、安宁至龙和城（禄丰），谓之西爨。”

阁罗凤东征统一云南，20多万户白蛮被迁往滇西地区。白蛮西迁，《蛮书》卷4说：

“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围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是后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龙和以东，荡然兵荒矣。”

宋代，白蛮继南诏之后，在洱海地区建立了与宋王朝相始终的大理国。大理国的建立，使白蛮的人口和文化中心从此转移到洱海地区，奠定了现代白族以洱海为中心，散居滇中、滇东的分布格局。

公元1258年，云南的蒙古军北上湖南夹击南宋，蒙军主帅兀良合台组织白蛮军队爨爨军随征，在取得谭州（今长沙）之役的胜利后，与忽必烈会师鄂州。爨爨军被解散，部分白蛮士兵流寓定居于湘西，成为今天湖南白族的先民。

明清时期，白族分布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滇东、滇中的部分白族融于汉族之中，东部白族分布点相对减少。

### （三）哈尼族

哈尼族是氏羌南迁中分化出来的古老民族。哈尼族历经迁徙，民间文学中关于迁徙的史诗、传说最为丰富，汉文献的记载则相对较少。

《尚书·禹贡》所记西南民族中的“和夷”，据认为包含有哈尼族的先民。<sup>①</sup>和夷早在公元前 3 世纪，已分布于今四川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及安宁河流域。

唐朝前期，哈尼族的先民已迁到洱海至滇池之间及滇南地区，并开始从乌蛮、白蛮中分化出来，被称为“和蛮”。《新唐书·南蛮传下》说：

“显庆元年（公元 656 年），西洱河首领杨栋附显、和蛮大首领王罗祁，……率部落归附，入朝贡方物。”

南诏大理时期，哈尼族先民继续南迁，分布重心移到滇南地区，这时哈尼先民被划入东部的“三十七部”之中。“三十七部”中的因远、思陀、溪处、落恐、强现、维摩、王弄均为和泥部落。

元代，哈尼族被称作“斡泥”或“禾泥”，哈尼族已完全

《哈尼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